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劳工研究



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类型与劳动力人口流动

梁玉成 刘河庆

双重商品化与学生工的抗争

苏熠慧

——以厂为例

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

王开庆

——对一家私人工人劳动过程的研究

农民工城镇化研究：方法论反思与理路澄清

曹志刚

劳动力市场退出：留乡农民工的特征与困境

范长煜



CHINA STUDIES **No.21**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2015年春季卷总第21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研究. 2015 年. 春季卷: 总第 21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97-8868-4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研
究-中国-现代-丛刊 IV. ①D66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6083 号

中国研究 (2015 年春季卷 总第 21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佟英磊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29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868-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 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 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 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 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 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 远
郭 未

英文编辑：
秦 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20 和 21 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

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目 录

主题研究：劳工研究

- 现实与期望：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劳工研究（主持人语）…… 刘林平 / 1
- 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类型与劳动力人口流动…… 梁玉成 刘河庆 / 6
- 双重商品化与学生工的抗争
- 以 F 厂为例 …………… 苏熠慧 / 26
- 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
- 对一家私企工人劳动过程的研究 …………… 王开庆 / 45
- 农民工城镇化研究：方法论反思与理路澄清 …………… 曹志刚 / 66
- 劳动力市场退出：留乡农民工的特征与困境 …………… 范长煜 / 83

学术研究

- “产权明晰”的迷思：科斯的权利观 …………… 王水雄 / 114
- 邓正来的“思”与“不思”
- 关于选择学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 …………… 姚选民 / 141
- 政社合作模式下地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质量的测度
- 关于 Z 省 N 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 张新文 詹国辉 / 157
- 都市社会的结构冲突
- 阶层地位如何影响政治态度与公民参与？ …………… 葛天任 / 174

族际居住隔离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

——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王朋岗 / 196

高等教育扩张与民族教育不平等研究 吴 炜 / 214

民间艺术的文化传统与教育功能

——基于湖北云梦皮影戏的历史考察 魏晓锴 李佳佳 / 229

书评与随笔

生活在阴影下

——作为失败者的底层阶级及其影子价值 王佳鹏 / 243

台湾留学散记 吴心越 / 255

稿 约 265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266

现实与期望：立足本土经验 事实的劳工研究（主持人语）

刘林平 *

本刊中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留乡农民工之特征与困境，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所生产的工人对游戏规则的同意与工厂秩序的接受，劳动力商品化与教育商品化对学生工的影响及其回应，对农民工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这些文章各有特点，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读者自可评判。本刊将之集结在一起，是为了显示农民工（劳工）研究是中国现实社会研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群体，至 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7395 万人。^① 他们的行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和城市、内地和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版图，创造了令世人惊奇并将载入史册的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也留下了血汗与眼泪交融的中国故事。

相应的，农民工（劳工）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我们以“农民工”“外来工”“劳工”“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 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linpingl@163.com）。

① 参见《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_2854930.htm。

表 1 CNKI 历年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论文情况

时 间	研究论文		
	总量(篇)	定量研究(篇)	定量研究占比(%)
1990 年以前	4	0	0
1990 ~ 1999 年	221	13	5.88
2000 ~ 2009 年	6619	1100	16.62
2010 ~ 2014 年	10963	2600	23.72
合 计	17807	3713	20.85

截至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共发表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论文为 17807 篇，其中，定量研究的论文占比超过 20%。自 2010 年以来，相关论文每年发表数超过 2000 篇。这些论文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多个学科。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题众多、内容丰富，多数论文有较为扎实的经验事实支持，一些文章的观点或看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其中一些专题研究（如劳动力市场、权益保护等）已经较为深入，一些结论（如农民工权益严重受损）已经被不同时点、地点的调查所反复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毋庸讳言，相关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或缺陷。我曾经较为仔细地阅读了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文献，并从研究资料、概念框架、社会背景、学科立场、研究方法、因果关系和政策设想等方面指出了这些研究的缺陷（刘林平等，2015：77 ~ 78）。我认为，这些缺陷也普遍地存在于整个农民工（劳工）研究领域。

对于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成就与缺点进行较为完整的总结，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胜任的。我在下面想就农民工（劳工）研究要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问题，与学界同行探讨。所提看法，只是抛砖引玉，敬请批评。

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农村或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众所周知。近 3 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迁移流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观念，一句话，他们的行为活动所留下的轨迹或经验事实之丰富、多样，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社会科学面对这一巨大宝藏，理应好好发掘。可惜，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

其一，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一些“博客”式的论文，对此必须提出质疑。

由于农民工几乎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其

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觉得都有能力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一些社会科学论文常常以提出几个观点并列举一些案例或数字的方式来表现研究成果。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我将这一类论文视为网络上常见的“博客”。撰写博客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但以科学的名义或者在社会科学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博客”式论文是不可取的。科学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要用经验事实去检验科学假设，而对经验事实并不是随意取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缺乏科学程序所获取的经验事实，往往是不可靠的，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当然，还有一些完全不顾经验事实而从抽象理论出发的论文，那些文章属于空头理论，我对此不做评论。

其二，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众多的定性或质性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仔细斟酌、反思。

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自有其价值，这一点不用怀疑。但质性研究，尤其是当下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并有不少研究仅有单一案例，大多数质性研究者也没有抽样的概念，案例的选取往往基于便利或随意，因而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质性研究的小样本当然不适合采用随机抽样，但“放弃随机选择也意味着偏差发生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罗伯特·维巴，2014：124）。不能随机抽样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选择样本，质性研究同样需要严谨科学的选择设计。更有一些质性研究往往只选取能论证自己研究结论正确性的案例，而对相反或其他案例视而不见。因而，质性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结论，对案例的“选择性”问题进行反思，切莫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定量研究的问题。“在统计推断中应用到的那些准则同样适用于定性研究”，“如果定性研究者能够关注那些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普及的科学推论原则，他们所从事的非统计研究的结论将会更加可靠”（罗伯特·维尼，2014：25）。

其三，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引发了众多的问卷调查，学者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大量的定量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有所反思并努力改进抽样方法。

如表1所示，定量研究论文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有较高比例。根据我们的检索，在CNKI数据库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总体上，定量研究论文仅占7.5%，这远低于农民工研究中的20%。由于经费或其他因素的限制，以往对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大多在其打工地进行，而农民工所在打工城市往往缺乏完整的户籍登记资料，很难获得一个好的抽样框。配额或偶遇抽样就成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主要抽样方法。在农民工来源地家乡进行抽样调

查也会遭遇空户较多等困扰。以完整的抽样框为基础的严格的随机抽样,并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的调查在农民工研究中还比较少见。因而,使用这样的数据所生产的定量研究论文也难免发生种种问题。解决方案之一是使用前沿的统计方法及其模型努力克服样本偏差,解决方案之二是改进抽样方法。我们在2014年6~8月对7省13市(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就采用了被访者驱动抽样,所得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并能对样本的质量进行评估(刘林平等,2015)。这或可给社会科学界在抽样上一些启示。

其四,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喷涌而出,农民工并不外在于大数据,使用大数据对其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应该紧跟的时代潮流。

比如说,快递业是当下中国快速发展的行业之一,其从业人员中农民工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轨迹基本被记录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数据库,使用这样的数据进行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还有,互联网上以博客、微博、微信等形式对农民工的形容、判断、评价形成了海量文本数据,对此进行分析是认知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特征的重要途径之一。使用大数据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现在还刚刚起步,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还不完善,但这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机遇。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对大数据及其影响视而不见,而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努力学习新的方法和技术,使用新的研究工具进行探索。

其五,哪怕有完整、理想的数据,也只是具有良好的数据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在农民工(劳工)领域或其他领域的研究还须面向前沿理论方法,与国际社会科学成果对话。

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自外于国际社会科学,建立中国的本土理论并不意味着不与国际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面向国际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首先必须广泛阅读文献。现在发表的众多论文,一个基本的缺陷是引述文献太少,尤其是英文文献太少。不少研究论文自说自话,不与以往研究成果对话,视研究文献为无物。其次必须进行多学科对话。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种学科,哪一个学科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在劳动力市场研究方面,劳动经济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学科可以向其学习,引入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西方的移民研究,也是多个学科考察的领域。最后必须确立现代学术理念。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理念关键是将其理解为科学,以科学的理论、程序、方法、技术、逻辑去进行研究,时刻警惕非科学的随意性,从科学而不是个体经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科学研究。

总之,立足本土经验事实,以亿万农民工行为后果所形成的丰富数据

为基础，中国的劳工研究已经并将进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必须警惕和质疑“博客式”的看似科学的论文，反思并谨慎对待质性研究论文及其结论，反思并改进定量研究论文的统计技术及更为基础的抽样方法，紧跟时代潮流，努力使用大数据进行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农民工（劳工）研究理解为科学研究，去除非科学的随意性。科学不可任性，社会科学亦不可任性为之。若如此，劳工研究或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一点一滴地取得进步，脚踏实地前进。

参考文献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201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林平等，2016，《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林平、范长煜、王娅，2015，《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郭未 佟英磊）

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类型与 劳动力人口流动^{*}

梁玉成 刘河庆^{**}

摘 要：研究集中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农村衰落的背景下，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对于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村间的变异。其次，分析不同农村类型所代表的农村拉力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依据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基于农村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家理性导致了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投入存在差异。新农村建设形塑下的农村发展类型，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市场力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和流入的马太效应被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反向修订。

关键词：村庄类型 新农村建设 劳动力流动 流出地调查法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种

*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2015 年重大项目“基于大型调查数据基础上中国城镇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基层治理研究”（批准号：15ZDB172）资助。

** 梁玉成，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lyucheng@mail.sysu.edu.cn）；刘河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liuheqing321@163.com）。

大规模人口转移在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建设主体缺位等巨大挑战（周祝平，2008）；有学者甚至提出村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将走向终结（李培林，2002；田毅鹏等，2011）。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大面积衰落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运用自身的财政力量，通过向农村定向投入建设资金等方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试图扭转农村发展局面。

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至今刚好十年，以此为契机，本文将探究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该效应在不同农村类型之间的差异；农村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本文还将探究农村发展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而较为完整地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后果。

二 研究综述

1. 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

农村人口流动由于其规模大、变动快、情况复杂，关系着中国城镇化的进度以及农村未来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早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规模及人口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因此研究多聚焦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Liang et al., 1997；段成荣、杨舸、张雯、卢雪和，2008）。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生活的日益艰难，以及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张术环、张文萃，2009），大量农民工选择从大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民工荒”与“回乡潮”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成因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章铮，2008）。

学界关于农村人口流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依据古典迁移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以及推拉理论。其中古典迁移理论强调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做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因此收入水平或者预期收入水平等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Todaro, 1969）；新迁移经济理论则与古典迁移理论有所不同，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其成员的迁移（Stark and Taylor, 1991）；“推拉理论”则认为宏观层次的劳动力流入地及流出地的不同特征及发展情况，意味着不同的推力和拉力，这同样会对人们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Murphy, 2002）。

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同时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潘静、陈广汉，2014）。朱传耿等利用 1996 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拉力”要素，认为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要素、投资要素有着显著关联。而李强则进一步研究了“推拉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现象的适用性，指出其与国外不同，中国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可能会使推力或拉力失去作用（李强，2003）。

学界关于农村人口返回迁移的研究，使用的理论依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以及推拉理论等（余运江、孙斌栋、孙旭，2014）。针对中国返乡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则多是从农民工城市生活、工作条件、权益保障、社会融入情况、家庭因素以及与家乡的联系等多个角度对农民工“回乡潮”的具体成因进行分析（白南生、何宇鹏，2002；章铮，2008；石智雷、杨云彦，2012）。

总之，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无论是农村人口外流还是回流，学者多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个体预期、家庭因素等视角进行分析，虽然推拉理论关注宏观层次的流入地或流出地特征对于人们迁移选择的影响，但因为数据限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而较少讨论农村的拉力。

实际上，2005 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惠农、扶农政策，使得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因此农民工的回流逐渐增加（王翌等，2007），农村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拉力在不断增强。因此，农村拉力讨论的缺失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学术空白。

2.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丁守海，2014），我国长期偏好规模经济，着力发展大、中城市，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发展取向造成的后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凸显，我国大部分农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陷入普遍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凋敝之中（温铁军、温厉，2007）。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以及大城市建设的种种负面效应的产生（赵新平、周一星，2002），政府开始重视农村以及小城镇的建设，最为典型的是自 2005 年以来，国家重点提倡并推行新农村建设。

该举措要求的重点是从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

村社会事业、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建设农村现代文明、增加农民收入等几个方面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李炳坤，2005）。政府提出从多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基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必然会有所侧重。如林毅夫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农村的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林毅夫，2005）。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方向。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力度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不同发展类型，缺乏基于农村本身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建设效应；并根据农村发展的主要指标，尝试划分农村发展类型。最后，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从个体及家庭视角研究农村人口流动，本研究运用基于流出地（农村）调查法得到的对农村社区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从村的层面出发，验证不同的农村发展类型与发展现状对于村庄人口流动的具体影响，从而在总体上对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和前景做出科学的评判。

三 数据

本研究使用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该调查涉及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文中简称“全国”）。CLDS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次的样本，并分别采用社区问卷、家庭问卷、个体问卷对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调查。2012年调查成功获得303个社区样本、10612个家庭样本以及16253个个体样本的数据；2014年调查成功获得401个社区样本、14226个家庭样本以及23594个个体样本的数据。

与以往绝大多数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不同，CLDS采用的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流入地调查法存在的难以克服的抽样框问题、样本选择性问题、追踪调查难问题和系统误差问题，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在减少调查系统误差、提高样本代表性、更具操作性以及可追踪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①。更为关键的

^① 各种农民工调查方法及其对比，以及CLDS的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的具体细节，请参考梁玉成、周文等的《流出地调查法：农村流动人口调查的理论与实践》。